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 世纪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

---

高星 侯亚梅 主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20 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

高 星 侯亚梅 主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李 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 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高星, 侯亚梅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10-1362-4

I. 中… II. ①高…②侯… III. 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文集 IV. K871.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597 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 世纪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

高星 侯亚梅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 31.25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362-4/K·609 定价: 18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裴文中与贾兰坡大师

本书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的资助

编辑委员会

主编：高星 侯亚梅

顾问：邱中郎 张森水 盖培 李炎贤 林圣龙 黄慰文 卫奇

编委：林玉芬 李超荣 高星 侯亚梅 裴树文 冯兴无 陈福友

# 目 录

序 .....	贾兰坡 ( 1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代前言) .....	高 星 ( 3 )
专家笔谈 .....	( 10 )
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石器的发现 .....	裴文中 ( 19 )
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 .....	裴文中 ( 30 )
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 .....	贾兰坡 ( 50 )
丁村旧石器 .....	裴文中 贾兰坡 ( 55 )
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 .....	邱中郎 ( 69 )
山西垣曲新发现的旧石器材料 .....	邱中郎 ( 71 )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 .....	贾兰坡 盖培 李炎贤 ( 74 )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 ( 79 )
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 .....	戴尔俭 许春华 ( 91 )
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李炎贤 袁振新 董兴仁 李天元 ( 99 )
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贾兰坡 卫奇 ( 108 )
富林文化 .....	张森水 ( 120 )
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 .....	盖培 卫奇 ( 131 )
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 .....	贾兰坡 ( 141 )
云南元谋盆地发现的旧石器 .....	文本亨 ( 148 )
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 .....	尤玉柱 汤英俊 李毅 ( 154 )
大荔人化石地点第二次发掘简报 .....	张森水 周春茂 ( 163 )
论华北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分布、埋藏以及地质时代问题 .....	尤玉柱 ( 171 )
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分析 .....	盖培 ( 178 )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	裴文中 张森水 ( 184 )
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传统 .....	戴尔俭 ( 192 )

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 .....	卫奇	(199)
观音洞旧石器文化 .....	李炎贤 文本亨	(208)
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初步观察 .....	黄慰文 祁国琴	(219)
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 .....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224)
丁村石制品再观察 .....	刘源	(234)
大布苏的细石器 .....	董祝安	(239)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 .....	张森水	(246)
石制品微磨痕分析的实验研究与考古应用 .....	侯亚梅	(254)
马鞍山遗址出土碎骨表面痕迹的分析 .....	龙凤骧	(271)
金牛山旧石器遗址(1978年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 .....	张森水	(282)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 .....	李炎贤	(294)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评 Movius 的分类体系 .....	黄慰文	(303)
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 .....	林圣龙	(309)
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 .....	卫奇	(323)
石球的研究 .....	李超荣	(336)
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 .....	林圣龙	(342)
盘县大洞的石器工业 .....	黄慰文 侯亚梅 斯信强	(358)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 .....	高星	(372)
中国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信息 .....	李炎贤	(386)
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 1998 年发掘报告 .....	陈淳 沈辰 陈万勇 汤英俊	(398)
周口店第 15 地点剥片技术研究 .....	高星	(407)
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	李超荣 郁金城 冯兴无	(419)
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 .....	黄慰文	(426)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 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论著 目录 .....		(441)
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大事记 .....		(473)
编后记 .....		(491)

# 序

贾兰坡

如果从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4件打制石器算起的话，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有整整80年的历史了。8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高龄，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却仍然年轻。然而就是在这年轻的领域，我国的学子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将人类在中国乃至东亚生存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万年，为研究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中心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

提起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不能不提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这一学术机构的前身正式成立于1929年，当时叫做“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周口店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解放后，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学研究所，更名为“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3年改组为直属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称研究所，至1959年最终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自成立以来，这一机构便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心，担负起在全国寻找和调查古人类化石和遗迹、发掘重要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研究古人类体质和文化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培养造就该领域科技人才的重任。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发现和发掘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少不留有该所人士的足迹；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很少不浸透着该所学者的汗水；在全国各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很少未经过该所的培养和熏陶。因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旧石器方面的研究，代表着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方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缩影。

转眼要进入21世纪了，回顾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百感交集。在世纪之交，我很想将我们这一学科的工作和成果汇总一下，总结一下取得的成绩，检讨一下存在的问题，明确一个今后努力的方向。可惜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当高星博士与我商量要编辑出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一书时，我十分欣喜和支持。出这样一本书真是太需要、太及时了。

这本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它将80年来，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和学习过的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论文收集在一起，系统地演示我国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示我国学者在人类起源和旧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诸多独到见解，汇集重要遗址丰富的信息资料。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并不仅仅是一部论文集。在论文之后，附加了该所人员著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献目录，这为检索查询该领域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书的另一个亮点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大事记，它为读者标出了一座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重大事件的里程碑，以编年的方式勾勒出这一学科的发展轨迹。此外，此书的编辑工作是由该所古人类研究室石器组的年轻学者们发起和承担的。后生们敢于承担责任，勇于为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献策、献力，这使我特别欣慰。我和裴文



中先生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培养出的第二代研究力量也在淡出学术界，“文化大革命”和出洋求学又使我们几乎失掉了第三代。我曾十分担心（至少在古脊椎所）我们这一家业是否会延续下去？通过这本书的编辑，我高兴地知道我们又培养出了一支可观的后继队伍。他们年轻，有朝气，有思想，有事业心。这使我看到了这门学科的活力和希望。

衷心祝愿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 21 世纪有新的突破和更大的发展！

2000 年 10 月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 (代前言)

公元 20 世纪初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种子被西方学者带入中国，并迅速在这块肥田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过八十多年的培育灌溉、风吹雨打，它已从幼株长成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上千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发掘，大量的学术资料得以积累、整理和研究，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中国学者通过勤奋的耕耘为复原华夏先民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体质的进化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探讨人类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迁徙和适应生存过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取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驻足世纪之交的门槛回眸和前眺，我们百感交集。在这一学科所走过的路上，几代学子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了一座座史前研究的丰碑，用勤劳的双手勾勒出一幅幅华夏祖先生生不息的历史画卷。我们为此感到骄傲和欣慰；而在我们的前方，未知的领域依然众多，新的课题与挑战又纷至沓来。于是我们又感到责任与重负。如何对过去八十年学科的发展进行恰当的定位和评价，如何总结和推广过去的成就，认识与反思存在的差距与失误，端正与明确未来的方向与任务，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在此我将尝试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历史的角度做一回顾，以理论和方法论的演变为主线进行分期和分析，并探索形成不同阶段特点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以此抛砖引玉，与同行交流和探讨。

## 引入与探索阶段 (1920~1937)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由欧美学者传入和启动的。早在 1913 年美国传教士艾德加 (J. Edgar) 即在长江沿岸寻找和采集过石器。他所采集的所谓石制品多无详细的地点和地层记录。1920 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 (E. Licent) 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中发现 3 件打制石器，这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1923 年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和桑志华在内蒙古和宁夏的挥套地区发现了水洞沟等 3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扩大了我国这一阶段的史前遗址的分布区域。

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也是外国人发起的。1918 年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 (J. Andersson) 首叩周口店的山门。1921 年在安特生的安排下，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 (O. Zdansky) 开始在周口店龙骨山从事发掘。从 1927 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属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周口店进行了连续 10 年的大规模发掘。1929 年中国学者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于当年 12 月 2 日在第 1 地点发现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轰动国际学术界，成为人类演化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同年裴文中还在遗址中发现用火遗迹；1930 年在下洞发现石制品；1931 年大量的石制品在周口店被发掘和确认；随后第 13、15、4 地点和山顶洞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重见天日，尤其是 1936 年 11 月贾兰坡连续发掘出 3 具北京猿人头盖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入鼎盛时期。

1937年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在随后的几年间裴文中与贾兰坡两位先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对周口店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由于加剧的战争烽火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初创阶段画上了句号。

该阶段持续短暂，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发现的遗址局限于北方的少数地点。此时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作为地质古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崭露头角，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基本上移植于法国。但其对探索中华民族的远古史和对学科的发展建设具有开创性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将古人类在神州大地生存的历史向前推移了50多万年，打破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无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断言。由于该学科的开拓者们来自地质和古生物学，具有广博的知识底蕴，在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中又采取多学科协作的方式，使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从一开始便注重与此相关的古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哺乳动物学紧密结合。这为该学科的后续发展设定了模式，并被裴文中先生形象地定位为“四条腿走路”。此外，裴文中尝试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期与排序。建立了以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山顶洞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3期的发展序列，并将其与欧洲旧石器文化序列相对比。这种分期与对比模式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方面，以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除了接受法国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之外，还做了一些开创性的、意义深远的尝试。他们将打隔分方、分层发掘、对出土物进行详细编号记录的方法运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为田野发掘的规范性操作奠定了很高的起点。为了证明周口店出土的石英制品的人工属性，裴文中开展了模拟打制实验，并将实验产品与发掘出土品及自然破碎的石片、石块在显微镜下进行对比观察，确定了人工与非人工碎石的区别标准。裴文中对碎骨也做了同样的观察，同时还对非人工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条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些研究工作在实验考古学、微痕研究和埋藏学等方面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至今深受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 材料积累、分类与描述阶段（1949~1979）

建国后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很快得以恢复，并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中心地位。1953年发现丁村遗址，次年开始大规模的系统发掘；1960年发现并发掘小南海遗址，同年发掘西侯度遗址、匭河地点群；1963年发现蓝田遗址、峙峪遗址，同时重新调查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文革”期间旧石器考古调查与研究被迫中断了数年，70年代初得以恢复。1971年发现石龙头遗址；1972年发掘观音洞遗址、富林遗址；1973年发现许家窑遗址、下川遗址，发掘鸽子洞遗址，并在元谋人遗址找到石制品；1974年发现金牛山遗址、猫猫洞遗址；1976年发现铜梁遗址；1978年发现小长梁遗址、大荔遗址和庙后山遗址。围绕这些丰富的遗址和材料，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

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完全由中国的学者独自承担的，是以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为主帅，以解放后自己培养的第二代力量为中坚，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下推向前进的。其成就是巨大的：大量更新世人类遗存的发现、发掘、收集和整理使中国一跃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并将古人类在中国分布的空间扩大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生存的时间则又向前推移了100多万年。这些为中国史前史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时空框架和翔实的基础材料。以贾兰坡为代表的一些

学者在探讨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方面，提出了华北匠河—丁村系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小石器传统、长石片传统及细石器传统等概念，表明该领域的研究已在文化编年的基础上深化到探讨文化的源流以至区域文化传统的成因。这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使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培养、锻炼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队伍。

当然，这一阶段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使处于黄金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新遗址的大量发现、发掘和材料的大量积累，使他们无暇对出土的材料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许多遗址的发掘缺乏连续性和后续工作，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和突破，仍然停留在地层学、类型学、形态学和文化时空界定、编年排序的层面上。裴文中先生在前期所倡导的模拟实验研究、显微观察和埋藏环境分析没能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研究重心局限在对石器的分类与描述上，而很少去探究这些石器的类型与形态所能揭示的有关人类适应与生存的深层内涵；对石器的分类与功能界定基本上凭主观判断，对材料的观察、表述和研究局限于所谓“典型标本”；对“石器组合”、“考古学文化”乃至“文化传统”的界定及分析多采取简单而直观的归纳、定性和类比。缺乏对遗址形成过程的观察和对一个遗址全部信息体系中部分样本的客观分析、甄别和定位。这些缺欠既体现出学科成长过程中必然的局限性，也反映出社会与外部环境对其施加的影响与限制。

此一阶段的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共同集合成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鲜明特色，亦即以用地下实物材料诠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宗旨，以延伸和复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己任，以发现和发掘为工作重点，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形态学为基本方法论，对器物的分类和描述为核心内容。这一特点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并对以后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制约。

## 与世界接轨的转型期（1980～）

20世纪后20年我国旧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1979、1980年发掘薛关细石器遗址；1981年发现东谷坨遗址、小孤山仙人洞遗址；1982年发现阎家岗遗址；1984年在金牛山遗址出土人类化石，发掘白岩脚洞遗址；1985年发现龙骨坡遗址；1986年发掘岑家湾遗址；1988年发掘四方洞遗址。从1986年起，在百色盆地调查和发掘出土手斧等大量的石制品；1987年在湖北澧水和沅水流域发现大量的旧石器遗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发现旧石器遗址群；1990年发现郟县人化石及石器，盘县大洞遗址；90年代初在泥河湾发现半山、马圈沟等多处遗址，并对东谷坨等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1992年发现鸡公山遗址、落笔洞遗址；1993年发现南京汤山人化石；1993～1994年在三峡库区调查发现68处石器时代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并在随后的数年间对其中的近20处重要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1996年发现并发掘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1998年发现人字洞遗址，发掘出土目前东亚时代最早的石制品；2000年在建始龙骨洞发掘出土早期人类化石和石制品。这些发现使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出现三个新的中心区域，即泥河湾盆地、三峡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

野外收获不但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尤其表现在对古人类从事生产与生存活动遗迹的寻找和辨认。在阎家岗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动物化石的有序堆放，进而推测其为人类居

住或狩猎藏身的古营地遗迹；在金牛山遗址中，发掘者辨识出人类“生活面”；在安徽毛竹山遗址，研究人员将由砾石、石制品组成的环带和小圆圈定性为“储料场和石器制造场”或“建筑遗存”；在湖北鸡公山遗址，砾石、石器组成的石堆区和“石圈”被推测为制作石器兼居住的“人类活动的场所”；在福建船帆洞遗址中人工“石铺地面”被揭露出来。虽然对上述一些遗存的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说明研究人员的视野已经由单纯的器物而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更广阔的空间。

基础研究得到加强，体现在对遗址、文化和区域性的综合研究方面。在北方，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沉积学、古环境学、古脊椎动物学、年代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分析、测试和研究；对北京人在该遗址的文化技术发展、生存方式和环境背景取得了深入的认识。在南方，对观音洞石器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其技术特点和文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将其扩展到区域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此外，对泥河湾和丁村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初步建立了区域性的文化演变框架，在一定范围内揭示了华夏先民的演化过程。这些发展变化说明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由长期的以器物为中心转化为以遗址为中心。

中国的学者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进行了尝试性总结，概括为南、北主工业的二元结构和若干区域性的文化变体。对细石器传统的起源和发展的探讨、北方旧石器文化区域渐进学说的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体系的划分及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新分期。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对旧石器文化发展趋势和动因的阐释。古人类群体在中国演化的连续性与独立性、石器原料的劣质性、竹器的大量使用、因环境而导致的特定适应生存方式等，这些都被不同学者解释为形成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缓慢、规范性差、加工简单等特点的原因。

与此相关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东亚是否存在以手斧为代表的西方旧石器技术模式，这成为9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焦点，并由此炒活了早已沉寂多年的“莫维斯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东亚与西方的远古文化和技术是并驾齐驱的，为同一个文化体系，并引入古人类群体迁徙浪潮和全球古气候、古环境的同步演变作为论据；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乃至东亚不存在真正的西方阿舍利类型的石器文化，两地在史前技术发展方面各自具有独特性。与此相应的是对中国北方石叶和细石器来源的探讨。持本土论者认为在华北早期的石器文化中已萌生了这样的未来技术，而另外的学者则将目光投向西、北方向寻觅新的文化源头。对这些争论还未能达成共识，但讨论的本身已表明中国的学者在学术上、心理上摆脱了疆域和民族的局限。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是方法论的变革和改进。首先是田野方法的改革。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意识到用地质古生物学的作法及水平方格法已不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因而力求发掘做得更细、收集材料更全面、野外记录更完整。这一发展趋势在90年代初得到普遍的推广。中美考古学家在泥河湾盆地发掘时，将国外已十分普及、成熟的考古发掘方法运用到考古工地，对文化层进行大面积揭露，对出土遗物进行详细的坐标和埋藏情况记录，对移出的土石进行仔细的筛检，对有关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进行更全面的收集、观察和研究。在这种技术操作下，遗址成为了全方位信息的载体，遗物、遗迹间有了内在的联系，而研究者的目光既能聚焦到文化信息的最小单元，又可扩展到对整个遗址的宏观把握。

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为先河，中国的学者开始注重表述与研究的量化，定量分析的理念开始渗透到考古研究之中，使学者们开始摆脱带有强烈主观和随意色彩的定性研究模式，对材料的取舍、

表述和研究更全面、更客观、更具有可比性和可用性。与此相应的是规范化的倡导。由于认识到西欧的石器类型学和相关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中国乃至东亚的类型学体系，并试图在学术术语、定位、定性等方面建立统一的规范。尤其在对台面的分类、石核与石片的类型划分，石片背脊的力学分析、刮削器和砍砸器的区分、砾石石器的分类，器体大小的界定上。

裴文中先生所倡导的实验考古学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在 80 年代中、后期又形成了一个高潮。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基地，以在读研究生为主体，一系列的实验项目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这些尝试主要集中在打片与制作石器、骨器方面，但也包括了使用与功能实验和骨制品的埋藏学实验。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宏观规划，实验的结果未能很好地总结和应用。关于微痕分析，在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进行过有益的尝试，证明该方法对中国的一些材料仍然适用、有助。但这一卓有成效的方法未能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此相似的是拼合研究和动物考古学。二者都被尝试和应用，只是缺乏系统、持久，也因而为其在我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在研究理念上也出现一些可喜的变化，80 年代初引进并得以具体应用的“动态类型学”概念便是其重要的代表。在这一概念下，石制品类型不再是绝对、固定、孤立和静止的，而是相对、能动、可以变化和转换的；某一石制品不再是人类石器制作的终极产品或制作者思想锁定的目标产品，而是人类制作工具并用其从事生产和生存活动而产生的一系列产品中的某一环节，“典型标本”与“非典型标本”的界线被打破。这样的理念无疑是对传统的类型学和形态学的挑战，但与 80 年代开始在美、法等西方国家流行的技术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technology）、操作链（chaînes opératoires）和器物生命史（artifact life history）等观念相吻合。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队伍中的第二代为主的，第三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队伍上呈现新、老交替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在其后期未能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人才的断层在不断扩大，学科的发展遇到了致命的阻遏。

这一阶段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处于明显的变革时期，带有强烈的转型色彩。一方面旧有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材料的发现和报道仍然是成果的主体，分类与描述仍然是一些研究项目的核心，文化传统及其时空的界定仍然是研究的主线。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出现一些突破和创新，源自西方的一些现代考古学理论、方法和理念也渗透进来，并得以应用。在野外工作中发掘更规范、更科学，信息的采集更系统、更翔实；室内研究则更深入、更客观、更全面，方法手段更多样，理论探讨更活跃。但必须看到这些发展仍然带着很大的局限性，新的分支领域还不很成熟，舶来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的材料还未能很好地磨合；在对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行为的理论阐释方面还显得生硬，带有片面和主观的烙印，缺乏严谨的中间推理和论证。

## 对未来的思考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出现崭新的面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因而，我们必须对学科做必要的加强与调整，使其能有长足的发展。

1. 夯实学科的基础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学科。它汇集和借鉴了古生物学、地

质学、历史学和年代学等诸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方法仍有薄弱之处。其一，对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还没能很好地磨合、消化和提纯，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其二，在学术语言和专业词汇方面还存在着混乱和争议，尚未取得统一；其三，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够，对材料的取舍、表述、定性和研究的程序、方法存在着个人的倾向性和随意性，缺乏统一的标准；其四，在研究方向和手段上狭窄、单调，缺乏专业分工。这些缺欠影响了学术的交流和探讨，制约着学科的健康、深入发展。因此应在学科基础的构筑方面狠下工夫，发展和完善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规范行业术语和科研行为。

2. 强化学科与研究的规划 以往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兴趣和选题是由材料决定的，并随着材料的改变而变化，缺乏研究立项的主动性、规划性及学科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和宏观规划。为改变这种局面，政府和科研单位应加大对该学科的投入、规划和引导，设立专项基金，建立全国性的研究中心和若干区域性的研究实体，根据国际上的热点并结合我国的资源条件设立重点研究课题，对已有的材料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并能在课题与人员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3. 拓展研究的深度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使外国学者在探讨更新世人类文化时不能忽略来自中国的信息。近十几年来某些西方学者对北京猿人用火证据、狩猎能力和洞穴使用方式等提出了质疑。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尚不细、不深，对许多问题尚未做出令人满意的阐释。我们不能停留在对材料的积累、分类、描述与介绍的层面上，而应进一步挖掘出这些材料深层的内涵和蕴意。在研究方面第一阶段实现了由器物向遗址的转变，现在研究的视线应由遗址到人，将研究的视线透过遗址中的各种现象而聚焦到古人类的生存行为，包括他们的技术特点、生产过程、生存方式、社会组织和创造这一系列的考古学文化的动态过程。

4. 拓宽研究的领域与空间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遗址的埋藏环境和过程、伴生的动植物化石、人工碎骨和碎石上的痕迹、工具上的加工物残渍等都包含着古人类的行为信息。另外，人类对生存地域的选择和生存方式，对原料的开发、技巧和程度，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等都是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热点课题。因此我们应将旧石器时代考古由专注于石器分析而扩展为全信息、全方位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广度上与世界接轨。

5. 改进、发展和完善研究方法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方法论很强的学科。分类与描述是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基础，但这种做法本身有待完善之处。一方面我们常常将器物类型绝对化，缺乏对人类行为过程和工艺流程的动态思考；另一方面我们的分类和描述往往限于主观定性和片面性，缺乏客观的标准和定量、全面的表述。因此，我们在方法论上必须实现由主观向客观、由定性到定量、由片面向全面的转变，发展和完善包括数学统计分析、计算机数据处理和模式的建立与石器制作与使用的模拟实验、微磨损观察—工具性能分析、拼合研究，等等。当然，这些方法、手段的应用必须与中国的材料特点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创新。用相同的方法研究相同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与世界的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有效地参与世界热点课题的研究。

6. 扩展研究的视野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项世界性的学问。目前，西方的学者已将研究的触角伸到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框架和中国境内旧石器文化传统的界定和探究，而应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遗存。我们可以先将周边地区纳入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研究的领域，从全球的视野和高度聚焦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对现

有的资料做出更客观、更全面和更深刻的定位、认识和分析。

7. 加强联络、交流与协作 开放和宽容的环境、畅通的信息交流与专业人员间的良性互动是科学发展的必备条件。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协作的机制，尤其是大课题运作的方式。使参加人员共享资源、共担责任、共有成果，营造互通、互惠、互动的氛围。此外，建立专业学术组织，加强业务上的联络和协调，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建立专业网站，强化信息交流，都应是当务之急。这种形式可以扩展到国家间的层面上。目前正在与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酝酿成立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联合会。

8. 加速人才培养，壮大研究队伍 科学研究以人为本。在 20 世纪末，中国的旧石器考古队伍随着前辈的退出，出现了断层。为使这门学科得以强劲、持续的发展，必须加速人才的培养。可以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增设博士、硕士点或开设旧石器考古研究生班培养高级人才，这种人才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要有数量众多的业务人员去发现、发掘、整理，构筑学科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支队伍中必须有专业人员。目前旧石器考古学在研究理论、方向和方法上已有了细致的分化，这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还应该培养具有宏观视野、敏锐的创新意识和高度责任感与团队精神的人才，能影响和牵引学科的发展方向，并在国际学坛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本学科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是一个充满欣喜与崇敬，同时也偶感焦虑与凝重的过程。20 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赢得过荣耀与成就，也不过偏颇与滞后。那么在 21 世纪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目前的研究在整体上还处于转型阶段，水平参差不齐。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是在学习、跟踪和模仿，还无暇和无力做出很多的创新。但我们的目光会更远，目标会更大。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尽快做出学科规划的战略调整，在理论、方法和手段上大胆引进、锐意创新，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抓紧打造领军人才，壮大学科队伍，那么我们就会在未来 20 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力争本世纪中叶在该领域的世界大舞台上挥洒风流，引领一场恢宏的东方之舞。

高星

2002 年 5 月 1 日



## 专家笔谈

### 从周口店的石锥谈到衣服

贾兰坡

1931年，我和卞美年先生到周口店之后，没有几天裴文中先生就拿出一件小石器给我们看，还问我们，“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石器，但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是一头有尖，一头是扁平的薄片。这是1928年他从步林（B. Bohlin）等人发掘出来的非洞穴所产的碎石块中捡出来的，倒像个石锥呢！

1931年，我们到了周口店之后，没有几天，即发掘龙骨山东北角的鸽子堂洞。洞穴的堆积为角砾岩。角砾岩夹有两层薄灰烬，上、下层的灰烬中都夹有外来的岩石——脉石英。上层为石英1层（Q1），下层为石英2层（Q2）。后来混合为一起，即为鸽子堂北壁。

由这里发现外来石块、烧骨、烧石和动物化石，另外还有一块烧过的木炭，被植物学家鉴定为紫荆。我第一次见到的石锥和首次参加发掘的鸽子堂洞，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吸引着我走进了旧石器考古的广阔天地。

我一直认为，研究石器的用途，才可能达到人们的要求。什么叫做衣服，就是从那件石锥引起的。前些年，我参加了赴香港讲演团，其中有启功、朱家潘、黄苗子夫妇、王世襄、牟小冬夫妇等先生和女士们。黄苗子夫人是研究古代衣服的，从她所谈的古代衣服，我即想到在周口店首次见到的那件石锥。我就问她：“什么是衣服呢？”她一打愣，说：“我们穿的都是衣服哇！”“那么，衣服的定义呢？”她未做出很好的回答。近年来，我还向来访的朋友请教，但也一直未得到满意的回答。

我一直要向朋友请教对衣服解释的目的，是因为在“北京人”遗址里既然发现石锥，那么是否能将兽皮穿孔，用皮带缝缀成简单的衣服呢！按我给衣服的定义，只要简单地缝缀就能成为衣服。我在香港看到黄苗子夫人所带的女装，感到愈老愈复杂，和现在女装相差甚远。

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天安门前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塑造的“北京人”背鹿像，是我和杨鹤汀先生为主塑造的，就未给他穿衣服，只是体毛较多，身背一条小鹿，腋下夹着一根棍棒，赤身裸体。同行们对此或许有其他解释，请提出来，以便得到更好的答案。

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发现不少的旧石器地点，但研究方法未超出20世纪30年代水平，特别是旧石器在使用上还得不到统一认识。有的以类型命名，如小尖状器、大尖状器等；有的以用途命名，如刮削器、砍砸器等。比如大三棱尖状器，即可以命名为“手镐”（即不带柄的刨土工具）。至于小尖状器，经过摸索研究，用放大镜观察刃口，模拟试验，最终得到人们的认可。

研究旧石器，光研究石器还不够，也得研究骨器。懂的东西越多，对自己越有利。比如已病故的林一朴先生曾由云南省元谋县蝴蝶梁子采到过一块似有人工打制的骨片，黄慰文先生看到过一件似有人工痕迹的鹿角和许多花岗岩上剥落下来的石片，以及若干“猿”类的牙齿。这个地点，林一朴曾在